

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讨论

[文/潘光哲]

[内容提要]本文以整合式的思考取向,探讨“改造国民论”这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深具连续性的议题。近现代中国各种“改造国民”之论述,有其渊源,而其影响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处境的现实关怀。提出“改造国民”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进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产生了相关的行动,涉及的层域也相当广泛。学界若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论述内容之差异,显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显出较有新意的解析,当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学术价值,对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当的评估。

Abstract: The issue of “transforming the nationals” has a lasting impact on social life in modern times. Those who expounded on this issue put our nation under critical scrutiny and produced some good ideas. It is worthwhile to review these ideas and take the discussion to another level.

一

回顾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各种思潮、运动相互激荡冲击,史家从历史的脉动中,勾勒某一思潮、运动的变化趋向,省思其与现实互动的意涵,成果向称丰硕。而值得吾人可再致意的课题却仍不在少数,“改造国民论”即是其一。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个约萌生于一个世纪以前的甲午战后时代的论述,刻镂了斑斑历史的轨迹。从历经过变法维新阶段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在尝试以制度的兴革做为追求富强的行动遭遇失败,被迫流寓海

外之后;亦或是提出反满革命主张,宣誓成立民主共和体制,正昂首阔步前进,以遂其志的知识分子,如革命派;乃至因故而羁留禹域,企图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层面以挽救危亡的知识分子,如严复,率皆曾提出可统称之为“改造国民”或“新民”的论述与行动。并随时光之推移,延宕至“五四”时期,论述旨趣颇为一致的论述,更是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甚且时至1980年代,基本旨趣并无二致的论述,在台海两岸犹然清晰可见。

整体而论,这一论述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国势颓唐,将有亡国灭种之忧,系因国家构成的基本单

位:国民,不论道德、品性、亦或智力、体魄等各方面皆问题重重,无能承担因应世变之亟之责,卒濒于此境。因之,意欲拯救危亡,并达成中国的富强,则需仰赖于每一个中国国民个人的改造。是以,提出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针对中国国民在公共事务层面与私人生活领域的诸般弊病,进行强烈的抨击,如痛斥中国国民既愚且劣,复亦保守而又惰蠢,或声言此等弊端之因,在于为“奴隶性”或其它弊病所缚,而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补救改正之方。也就是说,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这一论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二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统而论之,即产生了相关的行动,而其用心则与现实更有密切的关联。共同特征:以西方之学说为立论之依据与根本(如达尔文、斯宾赛),企图藉此彰显中国本身各方面的阙失与问题所在,由政治体制之改革转向对文化思想层面的反省。

如严复即对此颇有述论发明,力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①;梁启超倡“新民”之论亦云:“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②;他又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③,其言论更曾引领一代言论之风骚。而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对革命工作者道德的重视,自许为“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神精病”精神的终极典范,以传染给其它革命者,乃至传染给四万万国民,以终遂革命之功^④;如邹容倡言要以革命教育“改造国民”^⑤,亦皆显示他们将国民改造论与革命行动结合起来的用心所在。而检视清末民初时期的期刊著述,各式各样痛斥中国国民智能愚蠢、品格低劣、遇事不知进取,而又流于巧伪,彼此相残,统而言之,置诟中国国民为奴隶,责中国国民为劣种之论,不一而足^⑥。

至若“五四”时期,此等论述更是席卷一代思

想言论风潮,如鲁迅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狡猾”^⑦。又如,以疑古之名而著称的北大教授钱玄同即云:“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⑧。诸如此类的批判及其倡言改造国民的言论,更广为人知。而又如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口号与行动的兴起,也显示知识分子对人民百姓文化价值观中某些陈腐不堪而又盘绕错结的成份,意欲改造、重塑的努力^⑨。

而至1930年代,颇受左派知识分子批评的,胡适的“五鬼乱中华”论,以为中国应该铲除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⑩,亦可谓同调。而又如1920、30年代出现的“乡建运动”等以广大农村之重建、农民之启蒙为对象的行动,虽与胡适之坐而论道颇有区别,但如晏阳初说中国农民之“愚贫弱私”为四大病症并有相互的连带关系^⑪,彼此论断观点的差别却也不是那样泾渭分明。

然而,到了1980年代,“改造国民”的论述,竟也再兴波澜。如台湾之柏杨发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即痛斥国民私德之浇薄^⑫,台海两岸俱回响不已;被认为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四大领袖的大陆学者温元凯,亦有以《中国国民性改造》为名之论著,提倡新观念,以期“改造国民性”^⑬,俨然重唱近百年前即已响起的号角。1980年代末期震动海峡两岸的《河殇》影片,究其实际,则是以现代传播媒体的强大影响力,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思维,期望“改造国民”^⑭。这样的景况,是否显示“改造国民”之论述并未随历史长河之流逝而终歇,其渊源影响,似颇有可待发掘阐释的空间。

与“改造国民”此一论题相关的言论与行动,所涉亦广。例如,清季以兴学教育为“开民智”之资的运动兴起^⑮;又如,自戏曲改良方面着手,以

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以达“广开民智”的启蒙作用^⑥;王照等则对改革汉字的倡言与构思,为“开民智”运动另辟快捷方式^⑦;又如,禁绝鸦片行动的出现^⑧与妇女“不缠足运动”的兴起^⑨,或是像潘光旦提倡“优生学”^⑩,皆显示其或在“开民智”方面下功夫,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说立论。由此更可知,“改造国民”此一论述所涉范畴颇为宽广,举凡教育兴革、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社会风气改良或是西式优生育儿保健观念之引进等,与此一论述都有深切的关联,亦实颇有深掘整合之必要。

二

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学界仍无具体完整的专题研究成果。

整体讨论方面,中国大陆学者任剑涛撰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亦涉及近现代史上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论述^⑪,但这部专书之立论宗旨在于呼吁理想中国国民性的建立之道,而仅以一章篇幅胪列这个课题,故其与现实关联较大,不免降低其学术价值。美国学者魏斐德(F. Wakemam, Jr.)亦有专文整理了对于“国民性”(尤其是关于“中国国民性”)这个问题探究的既有成果^⑫,颇有新意,而征引之史料偏重于以英文写就的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文献^⑬,稍嫌过简。孙隆基有讨论晚清时期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改造国民”论述及教育改革、革命运动之关系的专文^⑭,是探讨此一论述内容比较丰富的成果,但仅限于晚清时期,未及其余。

在提倡此等言论之论者的研究方面,亦未能着重此一专题而探究之。如一般分析严复思想的文献,都会讨论他关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观点。例如,周振甫即以为,此三者是严复的“养才”之本,与民主政治合之,即为严复的变法“治本

四策”^⑮;而美国史家史华慈(B. Schwartz)在他那部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中以“原则宣示”(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之论,总结严复在1895年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的涵意^⑯,但是未述及与此后论旨颇为一致的相关论述与行动之关联所在;大陆学者郭国灿在讨论中国近代“尚力思潮”时,即首举严复“鼓民力”之论的正面影响与贡献^⑰。

研究梁启超的文献,亦曾涉及于其“新民”论的研讨。如张灏在详尽分析“新民”论的内涵与意义后指出,梁启超的国民理想对20世纪各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吸引力^⑱,但未做比较具体的释证;刘纪曜的博士论文尝试论证,东渡日本的前五年(光绪廿四~廿九年)里,梁启超在“国民”观念的引导与对照下,以“奴隶意向”评价中国传统,《清议报》时代(光绪廿四年十一月至廿七年十一月),即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奴隶意向”最鲜明强烈的时期。刘纪曜并指出,当梁启超认真地实际地考虑改造国民、养成国民资格的实际有效手段或过程时,就必需比较认真而客观地探究中国的“历史遗传”或历史条件以提出“新民”之道,亦即“新民”或国民资格的养成,是有所本的在历史过程中的改造,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此即《新民丛报》时代(光绪廿八年一月至卅三年十月)的主题^⑲。黄克武的新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也以《新民说》为史料说明梁启超的“新民论”代表中国近现代史思想上的调适类型^⑳。他们的分析有助于对梁启超“新民”论的思考。

至于其它个别人物与主题的探讨也有可观之处。例如邹容之言论与地位,已有学者提出分析^㉑;而如鲁迅之“改造国民性”思想,则是中国大陆研究其思想的热门主题^㉒;如关于改革汉字,提倡国语以为启蒙、改造国民之资的言论与行动,也是

学者考察的对象^③;对《河殇》的回响,不仅有文化思想上的反思^④,亦更产生现实政治的影响^⑤。

整体而论,如前文所指出的,近现代国史上大量出现的抨击国民公共事务层面与私人生活领域各项弊病的言论,并就其针砭所及,提出补救改正方案,对此等言论与行动的意涵分析与阐释,除个别探讨外,尚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块尚待耕耘的园地。

三

如前所述,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这一论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统而论之,伴随民族自我批判言论而生的民族自我改造行动,其用心则是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应该对这些言论与行动的意涵,参照时空环境进行分析与阐释的工作,也就是说,自有以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取向进行探讨的必要。但是,除了以历史学取向探讨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历史意义外,另一方面,这个课题所涉及的学科范畴,不仅是历史学的,更与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有密切的关联。

首先,从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看,此一论述的基本意涵,当是继承传统“民为国本”之论而别发意蕴。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倡言以民为本,然其视角系以君主为主体,故历代名儒论此,率皆陈言君主应视民如子,博爱泛仁,以免失其国本遂至招亡。所谓“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系此意。所以,探讨这一个课题时,当对传统中国思想相对应的范畴例如“民本”思想^⑥进行分析,以解析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渊源与差别所在。

“改造国民”论述,虽亦将国家视为一整体,民为根本,本若不固、不振,国必亡矣,然则此处所谓之亡国,与一朝一姓之倾覆无涉,而是国家整体之

不存。其所意欲实践、改造之标的,则为国民(而非君主)。思惟之所在,引证之论点,大有出入,此则与近代以来西方思潮进入中土,渐为国人所熟知,并引为鉴证此一态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有必要考察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是如何以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做为对照的蓝本,成为批判现实的参照架构,并提出其言论与行动。

例如,孙隆基在讨论晚清时期“社会心理学”与“改造国民”论述及教育改革、革命运动关系的专文中即追本溯源,指出法国心理学家吕邦(G. Le Bon, 1841~1931)的影响。像梁启超即深受吕邦的影响,甚至在梁启超的论述中还直接采用吕邦的观点,足可证明梁启超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所受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影响之深^⑦。他的研究取向,为探讨这个课题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提醒我们在进行近现代中国史“改造国民”论这个课题的研究时,应重视分析是否有西方思想的根源与互动关系。

以严复为例,即应注意其论述与西方思想的关连。严复以为,西方之富强有其根本之道,在他看来,中国当时首应措意的便是拟摹一套治本之法,择善去恶,以臻于成:“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⑧。他又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⑨。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严复的论证与根本思路所在,则充分地显示了受到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Hebert Spencer, 1820~1903)观点的影响^⑩,而又有自己的创见。

在探讨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

前此的研究者都强调斯宾塞对严复的影响,但是,前辈学人之解析,或可再从另一个视角做进一步的省思。斯宾塞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普及者,影响深远^④。从19世纪英国思想界的脉络中来看斯宾塞的思想定位,可以发现,他被认为是当时英国“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论的代表人物,反对国家(政府)干涉(state intervention),因为斯宾塞认为国家(政府)干涉,会对个人之发展带来负面的作用与影响^⑤。严复固然认识到斯宾塞本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他说斯宾塞倡“任天为治”^⑥),但是,当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时,在他心目中,肩负起责任的主要承担者(the agent)却是政府^⑦。这是完全同斯宾塞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即令斯宾塞提出社会总体之品质系于单位或个人、细胞品质良劣之见解,对严复的“改造国民”论述有影响,但是二者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很明显的,严复身居濒临亡种灭族之忧的中国,与斯宾塞身处19世纪的大英帝国则是当时世界首强的“日不落国”,二者的现实处境有很大的差别,彼此提出的反思,也正呈现出这样的落差。但是,除了二者的现实处境的差异外,是否可能也因为有别因素,而导至他们有不同的结论^⑧?这是还值得做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注意斯宾塞对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之影响所在^⑨,更当注意,严复是怎么继承(或者“扭曲”)了斯宾塞本人的观点及其原因所在。

在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自1940年代起愈趋重视所谓“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例如,米德(M. Mead)之研究美国,潘乃德(R. Benedict)之研究日本,皆是此一课题之巨著^⑩。尽管,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进行“国民性”的研究关心的重点,也有为现实所用的旨趣^⑪,然若与近现代中国史上提出“改造国民”论之论者的关怀焦点是中国民族的存亡问题

相较,二者的现实意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惟当我们探讨近现代中国史上“改造国民”论的兴起这个课题时,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分析,还是有相当的参照价值。特别是学者关于传统中国国民性形成因素的研究,与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者提出之批判,比对二者论述的交光会影,应当纳入我们的思考^⑫。因此,必需注意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整合,以期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思想意涵的评估。

四

整体而论,近现代中国各种“改造国民”之论述,有其渊源,而其影响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处境的现实关怀。而提出“改造国民”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进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产生了相关的行动,涉及的层域也相当广泛。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说立论,亦或在“开民智”方面下功夫,甚或于“新民德”之道提出严厉批判。举凡如教育兴革、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社会风气改良或是西式优生育儿保健观念之引进等,与此一论述都有深切的关联,可待深掘探索,阐义释微。若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论述内容之差异,显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显出较有新意的解析,当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学术价值,对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当的评估。

总结论之,近现代国史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论述,各般行动,浪起潮落。各家论者与行动者,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侧重点,提出论述,展开行动。吾人若能慎思明辨,加以整合,厘清脉络,对于众相纷呈,景状万千的历史表象,当可有视野更为宽广的理解,更能掌握其深层

结构与涵意。本文之尝试,即就“改造国民”论此一课题略加申述,但望能引起关心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同好的兴味。

注释:

①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4。

②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文集》之7(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台2版]),页105。

③梁启超,《新民说》(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台2版]),页2。

④参见:李永炽,“大独与华严之行”,收入:氏著,《历史的爱音》(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4),页27-34。

⑤邹容,《革命军》,收入: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第1卷下册,页649-677。

⑥举例来说,由严复与夏曾佑等合办之《国闻报》即刊有莫详作者之“论中国教化之退”一文,收入:西江欧化社藏版,《国闻报汇(编)》(光绪癸卯[1903]6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3辑(总号321),台北:文海出版社,亦收入《严复集》,列为附录,见:《严复集》,第2册,页481-483;而如《清议报》曾刊出麦孟华“说奴隶”一文(《清议报》,第69册),即引起秦猛的回响,也以同样篇名的文章发表在《清议报》上(见:秦猛,“说奴隶”,《清议报》,第80册);而在《清议报》中也刊有不少类似批判中国国民智能之弱、道德之衰,无进取心,无国家观念的文章,如冯自强,“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即是一例(《清议报》,第73、74册);以上诸文,均收入:横滨新报社(辑印),《清议报全编》,卷2(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至于革命党人主办的刊物上,也有不少论旨颇为一致的文章,如《国民报汇编》的“叙例”,即首揭“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服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之论(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影印初版]);而如《国民日报》亦刊有“箴奴隶”等批评中国为“一绝大无外之奴隶国”这种论说旨趣相当一致的社说(收入:《国民日报汇编》,第1集,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

纂委员会,1968[影印初版])。若再尽心搜罗,当可有更多的发现。

⑦鲁迅,“论睁了眼看”,收入:《坟》,《鲁迅全集》(16卷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卷,页240。

⑧钱玄同,“回语堂的信”,原刊:《语丝》,第23期,引自:《语丝作品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页200。

⑨参看: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⑩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439-453。

⑪参见:李孝悌,“‘平教会’与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收入:张五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第8辑,页301-334。

⑫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台北:林白出版社,1985);关于柏杨此书引起中国大陆之回响情况及其争论与批评,参见:李怡(访问),林思(整理),“柏杨谈中国与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不是受到了诅咒?”,《香港》(九十年代),总207期,页70-78;并参见:孙国栋,《评柏杨》(香港:明报出版社,1989),页5-60。

⑬温元凯、倪端,《中国国民性改造》(香港:曙光图书公司,1988)。

⑭原著见:苏晓康、王鲁湘,《河殇》(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88)。

⑮学界首倡研究“开民智”运动的学者当推李定一先生,见:Ting-i Li,“The First Cultural and Social Reform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1895-1898 (Abstract)”,文刊:《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1970),页279-283;在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李昌华,“清季四川开民智运动之研究(1895-1911)”(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年1月,未出版);周丽潮,“湖南开民智运动之研究(1895-1911)”(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年6月,未出版)。

⑯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5章。

⑰王照之主张,见诸“庚子创造官话合声字母原序”等文,收入:氏著,《小航文存》第1卷,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⑱彭国亮,“西南三省(川滇黔)烟毒与禁烟之研究

(1911-1940)"(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6月,未出版)。

⑲林秋敏,“近代中国的不缠足运动(1895-1937)"(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1月,未出版)。

⑳参见:潘光旦,《优生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㉑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章。

㉒魏斐德(F. Wakemam, Jr.),“关于国民性的探索”,收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159-189。

㉓例如,林语堂的《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㉔Lung-kee Sun,“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Modern China*, 18: 3, (1990), pp. 235-262.[孙隆基后来从理论观点对“改造国民论述的历史脉络并撰有专书,亦已面世:Lung-kee Su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Armonk, N. Y.: M.E. Sharpe, 2002)--2003年作者补注]

㉕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4[台1版]),页92-112。

㉖参看: B.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ch. 2。

㉗郭国灿,“近代尚力思潮述论”,(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11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6月),页24-33。

㉘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97-307。

㉙刘纪曜,“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85年7月,未出版),页109,页117,页118-119。

㉚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㉛杜呈祥,“邹容的思想演变及其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收入:李国祁(等著),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页381-400。

㉜关于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之讨论,是中国大陆研究其思想的热门主题之一,可参看:鲍晶(编),《鲁迅“国

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张琢,《社会处方总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解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一书(台湾版易名为《中国文明与鲁迅的批评》)[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则分项解析了鲁迅的观点。

㉝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之普及化及国语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年7月),页13-45。

㉞关于《河殇》的相关讨论专书甚多,如:赵耀东(等著),《河殇讨论集》(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0);苏晓康(等著),《龙的悲怆:河殇回响》(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0);苏晓康(等著),《河殇集外集》(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0);苏晓康(主编),《从五四到河殇》(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2)等书;关于《河殇》在台湾引起的回响情况,可参看:彭广泽,“大陆文化出版热巡礼:从李泽厚到‘红色传统’”,《中国论坛》,第30卷11期(台北:1990年9月),页17-18。

㉟《河殇》在中国大陆引起的政治回响,但在1989年之后,《河殇》受到中共官方、学界的批判,可以参看:钟华民(等),《重评河殇》(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89)。

㊱参看: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㊲参见: Lung-kee Sun,“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pp. 241-246。

㊳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页25。

㊴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页18。

㊵关于斯宾塞对严复的影响,是既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如 B. Schwartz 曾有分析,见: B.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pp. 33-39, pp. 43-88;徐高阮也针对斯宾塞提出社会总体之品质系于单位或个人细胞品质良劣之见解,对严复观点产生的影响,提出析论,见:氏著,“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人对此型思想的批评”,收入:史华慈(等著),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页140-143;郭正昭则继承 Schwartz 与徐高阮对斯宾塞影响严复所在之检讨成果,以呈现出斯宾塞和严复之间的思想关联,见:氏著,“从演化论探析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页527-555;

而 J. R. Pusey 则别有己见,以为斯宾塞(或是达尔文、孟德斯鸠等西方思想家)之论,都只是严复本人论点的脚注(footnotes),见: J. R.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8-159;然而,这些前辈学人之解析,似可再做进一步的讨论,见下文。

④①参见: Richard Hofstadter(著),郭正昭(译),《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页 25-49。

④②关于斯宾塞做为 19 世纪英国“个人主义”论的代表性人物,及其反对国家干涉之论述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参见: M. W. Taylor, *Men Versus the State: Herbert Spencer and Late Victorian Individu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本书对于既有之斯宾塞思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批判,并指出不足之处,足可深化吾人对斯宾塞思想的参照与认识。

④③严复说,他之所以选择翻译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健将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即是因“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见:严复,“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严译名著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 X),可见严复确实认识斯宾塞本人有这方面的观点。

④④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批判了韩愈的“君臣之伦”观点后指出,中国犹未至“弃吾君臣”之时,因“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所以他假托“圣人”之名而高声疾呼(严复,“辟韩”,《严复集》,第 1 册,页 35):“吾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力、德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力、德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危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吾又乌德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曷贵私天下哉!”可见其肯定在君主制领导下的政府应扮演的角色;不过,严复也强调(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页 31-32):“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各郡县公举其守宰”

他的言论虽然有倡民权、行自治的色彩,但是,不论议院或民选地方行政首长都是政府体制;可见严复认为

政府应当肩负“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责任。

④⑤举例来说,严复与斯宾塞对所谓“社会”(society)这个名辞的观念会是一致的吗?严复曾将斯宾塞所提倡的“社会学”(sociology)译为“群学”,因为在《荀子》中有此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见:严复,“原强”,《严复集》,第 1 册,页 6);但是,斯宾塞对于 society 这个名辞的观念,却是将“有机体”(an organism)与“社会”(a society)做模拟的,“有机体”各器官之专业化,各有所司之功能,即犹如社会结构之分化日趋复杂,亦各有所司一般(参见: M. W. Taylor, *Men Versus the State: Herbert Spencer and Late Victorian Individualism*, ch. 4, esp., pp. 135-146),严复引《荀子》之论而立论,恐与斯宾塞之论有出入;而双方之认知不同,当不仅是现实处境的差异,而是更复杂的,对同一事物认知的不同态度而导致的。此等差异,值得吾人深究之。

④⑥或如 J. R. Pusey 之解析,斯宾塞对严复思想并无影响,亦可再加探究。

④⑦参见:许烺光(著),张瑞德(译),《文化人类学新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页 27-44。

④⑧许烺光指出,“国民性”的研讨受二次大战的刺激最大,因为需要了解日本人、德国人是个怎样的民族,而使许多人类学者试图探究这些历史悠久的民族的行为,可见此一课题也具有相当的实用性格;而今,“国民性”这个概念的科学效用虽颇受批评,但许烺光以为,对于促进人与人社会与社会间行为之心理基础的认识与了解,仍有其重要性,见:许烺光(著),张瑞德(译),《文化人类学新论》,页 42,页 157-158。

④⑨例如,中国家庭制度即是学者们分析传统中国国民性形成因素的研究对象之一,参见: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收入: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2),页 127-162;而“改造国民”论者即曾针对中国家庭制度提出严厉的批判,如傅斯年即说中国家庭为破坏个人个性的万恶之原,见:傅斯年,“万恶之原”,原刊:《新潮》,1 卷 1 期(1919 年 1 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一),上(编)丙“社会问题”(台北:国立台湾大学,1954),页 1-6。二者论述虽不尽一致,然而杨氏的分析,对我们思考傅斯年的言论涵义当有一定的帮助。

(原刊《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 19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后又作了补充说明)

责任编辑:青 天